



理论阐释

『富起来』的多维审视

关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思考（二）

□ 陈远章

中华民族“站起来”以后，就有“富起来”的渴望。所谓“富起来”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不断走向共同富裕。“富起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断实现的伟大使命。“富起来”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往前走的，但“富起来”真正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富起来”是一个伟大时代，领导开创这一伟大时代的核心人物是总设计师邓小平。这个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就是要“富起来”。

“富起来”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

对中华民族而言，“现代化”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因为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运动开始于西方，是西方列强殖民扩展的代名词，中华民族则是被动地卷入了现代化的潮流，成为西方现代化的牺牲品。古老的中国憧憬现代化，渴望通过现代化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先后几次想挤进世界现代化的快车道，梦想都破灭了，历史上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就是这方面的努力，最终都失败了。这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是迈不进现代化大门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化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实质性展开的。中国共产党曾经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开始艰辛的探索。由于特定的国际环境，加上“左”倾错误的干扰，现代化的方向和路径被严重扭曲。所以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那时起，中华民族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也开始了“富起来”的征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扬弃。新中国在酝酿和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时候，正是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大行其道的时候。该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传统必然是现代化的障碍；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阶段，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该理论的逻辑起点是“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西方文化是唯一先进的文化，西方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西方民族优于其他民族，担负着开化其他民族的使命。这种理论曾经大有市场。以致许多国家都想走西方现代化道路，像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洲国家韩国等，还有非洲一些国家。但后来大多数国家的预期都落空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人物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布罗克指出的：“没有一个把改革社会经济政治作为首要任务的现代化领袖，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是不会有很大改变的。”邓小平就是这样的“现代化领袖”。中国式现代化堪称邓小平的首创和杰作。邓小平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为了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进行，邓小平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定海神针”，那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其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全党必须把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贯穿于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全过程”。

邓小平告诫全党：“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之所以这么讲，主要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富起来”的战略选择，没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富起来”是不可能的。这一基本路线后来被称之为党和人民“生命线”和“幸福线”，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富起来”的“保障线”。同时，邓小平设计了“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路线图，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实践证明，这些设想都是切实可行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富起来”是中国的制度性成功

关于中国的历史性巨变，国内外有不少的诠释。比如，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资深顾问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雷默把中国的发展成就归结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认为这种模式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聚巨大的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这种观点是针对“华盛顿共识”提出来的，在国外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又比如，中央党校校委委员韩庆祥在其新著《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中把中国道路的制度优势归纳为八个方面，即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统一性，上行下效、令行禁止的权威性，治理决策与执行的高效性，政治秩序的稳定性，政策制定执行的连续性，区域部门联动的协调性，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灵活性，“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性。这个概括比较全面，在国内有一定的代表性。

经过长期的学习和积累，中国着眼于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形成和完善具有复合型优势的中国制度。这种制度为中国这样超大型人口规模、超广阔疆域国土、超悠久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超复杂社会治理的国家量身定制，因而在治国理政中表现出科学性、系统性、预见性和稳定性，这是中国成功的根本所在。所以说，中国的成功，或者说中华民族“富起来”，是制度性成功，而制度性成功，跟制度一样，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持续性、长理性。

“富起来”是对世界的开创性贡献

中华民族“富起来”是举世瞩目的大事，对世界的贡献是全方位的，有些贡献更是开创性的。其一，“富起来”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生。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质疑，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失灵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讲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新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洞察人类进入21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巨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系统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大发展。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总结并汲取了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这些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中华民族“富起来”的理论指南。

其二，“富起来”的实践挽救了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注入了正能量。苏东剧变后，世界两极格局被打破，资本主义体系重新成为世界的主宰，资产阶级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彻底战胜了社会主义，声称“历史的终结”，断言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方向。在国内，不论是政治领域还是学术领域，有的人别有用心，总是试图把中国拉到歪路、邪路上去。对这一重大问题，邓小平无论在什么场合，态度都非常鲜明。1987年3月，他对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说：“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现在看来，这些犀利而又深刻的言辞，讲出了我们党的自信，讲出了我们党的底线，愈益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中华民族“富起来”的实践证明，人类历史并未终结，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影响力、感召力，优越于资本主义，代表人类进步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中流砥柱，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人类美好未来的开创者。这为社会主义摆脱困境、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为大力发展中国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作者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论点摘要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张 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以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为理论指导，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和深层次、根本性变革为现实根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深刻认识这一重大判断的科学性，对于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以坚定自信的姿态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指出：“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去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时代变革的基本动力和显著标识，构成时代划分的根本尺度。社会主要矛盾不变，则时代不变，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时代必发生变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在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就以社会主要矛盾的演进为标准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大社会形态，为人类解放指出了光明前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直接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三个阶段，这就在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根本性的客体尺度之外，为时代划分提供了以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为衡量标尺的主体尺度。

20世纪初叶，在俄国革命蓄势待发之际，为了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列宁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宏大视野推进到一个更为具体的情势之中。他强调：“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

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他以当时俄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发展状况为参考，提出“战争与革命时代”历史定位，为进一步时代划分提供了综合性标尺。

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的论断，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为社会主义事业拨正了航向，与时俱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

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不同的时代划分尺度是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划分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新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代划分标准关照现实的结果。

新时代的科学根据

新思想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时代价值

四川省遂宁市委书记 赵世勇

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创造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并用“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系统阐述了这一重要思想

的丰富内涵和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思想的基本方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领会这一重大思想和基本方略彰显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和根本取向，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统筹“四个伟大”，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认识论维度看，这一重要思想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勇于和

善于理论探索、思想创新，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这一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为我们把握新方位、适应新要求、履行新使命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从方法论维度看，这一重要思想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从实际出发的实践导向。理论来自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判断，顺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变化，着眼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准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十四个坚持”构成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从价值观维度看，这一重要思想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执政为民的根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条主线。习近平总书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终要得到人民认可

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 李敦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担当使命”在当代最直接的体现。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努力，“三步走”战略中实现温饱和基本实现小康的两个目标已经实现。在未来几年中，中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直面“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得起历史检验，得到人民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要求“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否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关键在于人民是否认可。

获得人民的认可：一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所决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方方面面中贯彻群众路线，切实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二是国家今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以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经济中，“人”的创造力的发挥、“人”的潜能的挖掘和对人的“需求”的适应成为核心要素，13亿多日新融

入现代社会的人民，不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也是现代经济体系最为深厚的根源。三是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部分人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让人民共同享受到发展的成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正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入手，通过切实可行的战略举措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终要获得人民的认可，确保人民群众过上殷实的生活，在发展中得实惠，真正增强幸福感和获得感，真正看到发展、看到进步、看到希望，并使“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得到促进。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江苏省常州市委党校 袁崇安

“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核心价值观，并逐步发展成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党的十九大上上升为党治国治军的基本方略，这是党的宗旨观、群众观、人民观、发展思想和执政理念、执政方式的重大发展，形成了完整的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及实践体系，是党执政和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重要指南，成为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同时，首次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明确提出

来，并处于第一个基本方略“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之后，其他十二个基本方略之前的突出位置。这样，“以人民为中心”就从核心价值、发展思想上升为党治国治军的基本方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就是要深刻认识到人民的历史地位、主体地位和根本力量，就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在党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中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穿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坚持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总而言之，无论是党的理论、路线、方略，还是价值、目标、战略的确定与调整都必须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一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先后203次被提到，成为贯穿全文的最有温度的、最有情怀的核心热词，凸显了党处处“以人民为中心”这条一以贯之的红线。“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重大主题，在报告中出现232次，成为第一热词，而一切发展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报告还明确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基本目标就是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先后3次强调“人的全面发展”，6次提到“共同富裕”，5次突出“公平正义”。报告还提出“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的根本目的。